

李克绍

伤寒解惑

李克绍 著
李树沛 辑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www.jk1.com



责任编辑 苑嗣文

封面设计 李晨溪

李克绍先生（1910～1996）是20世纪最著名的伤寒学大家，《伤寒解惑论》是先生的代表作，见解独到，观点新颖，说理透彻，奠定了先生在伤寒学研究上的历史地位。

本书还辑录了《伤寒串讲》《伤寒百问》及先生研究伤寒的论文集。

学中医不能不读《伤寒论》，学伤寒不能不读《李克绍伤寒解惑》！

ISBN 978-7-5331-5903-0



9 787533 159030

定价：46.00 元

李克绍 伤寒解惑

李克绍 著
李树沛 辑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www.lkj.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克绍伤寒解惑/李克绍著. —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ISBN 978-7-5331-5903-0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伤寒论》—研究
IV. ①R22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4789 号

李克绍伤寒解惑

李克绍 著
李树沛 辑

出版者: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玉函路16号
邮编:250002 电话:(0531)82098088
网址:www.lkj.com.cn
电子邮件:sdkj@sdpress.com.cn

发行者: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玉函路16号
邮编:250002 电话:(0531)82098071

印刷者:山东教育印务中心

地址:济南市经十东路东首
邮编:250200 电话:(0531)89707018

开本:720mm×1020mm 1/16

印张:24.5

版次:201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31-5903-0

定价:46.00元



前言

伤寒学说研究,是父亲学术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中医学术影响最大的部分。父亲在从事《伤寒论》教学的三十余年中,曾对《伤寒论》中的争议问题、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以独特的思维,对伤寒学说中某些传统的观点,大胆细致地逐一驳析,以其非凡的勇气,创新性地提出了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李氏伤寒学术思想体系。

父亲的伤寒学术思想体系形成于几十年的《伤寒论》教学过程中。最早从他上世纪60年代初为学院本科教学而编写的《伤寒论讲义》中,便可窥测到他早期的伤寒学术思想。1978年,集父亲《伤寒论》研究成果之大成的《伤寒解惑论》出版,震动了伤寒学术界,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反响。《伤寒解惑论》也奠定了父亲在当代伤寒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使其成为全国颇具影响的伤寒学家。此后,父亲又先后撰写出版了《伤寒论语释》、《伤寒串讲》、《伤寒百问》,并在《中医杂志》与全国著名期刊上陆续发表了伤寒学术研究专题论文二十余篇。这些论著是在《伤寒解惑论》研究基础上的深入和补充,因而与《伤寒解惑论》一起,丰富充实了李氏伤寒学术思想体系,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更为详尽的资料。

纵观父亲一生的伤寒研究著作,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用研究他学术思想的学者们的话来说就是:父亲的著述,不论是专著或是论文,不论长篇或是短文,总是独树一帜,观点鲜明,言之有物,总能引起研究者浓厚的兴趣,读之欲罢不能。其所以能致于此,关键在于父亲的文章思辨性强,善于辨析问题,而且说理透彻。所以,他的学生在研究学习他的学术思想,掌握他的学术观点的同时,还从他身上学到了他独特的辩证思维方法以及严谨、执着、勇于追求真理的治学态度。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是一家与父亲著述有着很深缘分的出版社。从父亲

的伤寒学术代表作《伤寒解惑论》到集父亲一生著述汇编成册的《李克绍医学文集》都是由该出版社编辑完成的。此次,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把父亲伤寒学术思想主要的著述及论文汇集成伤寒专集,名之《李克绍伤寒解惑》,以此将父亲的伤寒学术思想全面地呈献给广大研究者,为研究父亲的伤寒学术思想提供了方便,这必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在此,对该社编辑工作者道谢。

李树沛

2012年5月18日

李克绍先生传



李克绍，字君复，晚号齐东墅叟。山东牟平人，生于1910年，卒于1996年，享年86岁。先生出身于农民家庭，其父务农兼有蒸茧技艺，每年秋收完毕，便赴东北缫丝厂工作，翌年春暖返乡，从事田间劳作，勤劳朴实，生活俭约。先生一生，勤勤恳恳，朴实无华，与幼年的家庭熏陶是分不开的。



先生7岁入学，读完四年制国民小学，又入高等小学读了3年，毕业后因家中经济条件所限，已无力再赴外地升入中学继续学习。正值山东当局提倡读经，东汤村西头的龙泉小学办起了读经补习班。这个班近在咫尺，才使先生得以继续学习。在补习班攻读5年，主要课程是《四书》《五经》《左传》等古文、古诗。这些课程奠定了先生雄厚的古文学基础，也为先生以后自学中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先生19岁担任小学教师，因感于农村缺医少药、农民贫病交加、苦不堪言，因此一边教学，一边学医，历时十年。利用课余、晚间、假日的时间，口不绝吟，手不停抄，终于在无师指导的情况下，通过自学粗通了《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匱要略》《本草经》等经典著作，同时也阅读和背诵了大量后世医家所著的医籍。其中，尤对仲景书精读细读，下工夫最深。1935年底，先生参加当时烟台市组织的中医考试，列全专区第二名，时年25岁。

先生取得了合法行医执照之后，仍一边教学，一边为乡里群众诊病。后终因就诊人数逐渐增多，影响教学，便于1938年弃儒业医，在原籍自设药房开业。先生对于病人极端负责，对一些重病患者，往往食不甘寝不安，直至病人脱离险境，才心安理得，面露喜悦之情。对于求诊者，无论贫富，一视同仁；对于贫苦之人，尤多关照，常免费施诊舍药，故在家乡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后又曾在烟台、大连等地挂牌行医，但由于当时日寇侵华，社会秩序混乱，所以时间都不太长。全国解放后，1954年底，先生应邀往威海市石岭联合诊所工作，任中医师；1956年，该诊所被国家接收，更名为威海市羊亭卫生所。1958年先

生入山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学习，半年后即由学员转为教师。之后，调到山东中医学院，任伤寒教研室讲师，自此定居济南。后又晋升为副教授、教授。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后，被遴选为全国首批中医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山东中医学院伤寒教研室主任、顾问，全国仲景学说专业委员会顾问，并应聘为张仲景国医大学名誉教授。1984年参加九三学社，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传略被《中国当代名人录》收录。1988年2月退休。

先生博览群书，学识深厚，医理精湛，从医从教五十余年，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著，在国内外极有影响。先生曾受各地之邀，赴北京、天津、南阳、沈阳、长春、大连等地讲学，所到之处，俱受到听众热烈的欢迎，并得到很高的评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先生所著《伤寒解惑论》，一扫旧论，见解独到，观点新颖，可以说是当代《伤寒论》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影响远及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深受国内外中医界好评，此书也奠定了先生在《伤寒论》研究史上的地位。

一、锲而不舍 自学典范

先生弱冠之年，本是小学教员。因旧社会教育工作者的职业极不稳定，加之叔父患热性病被庸医误药致死，才有志改业行医。但当时为什么不学西医而选择中医？令人感到意外而且有趣的是因受到反对中医者的启示，才决心舍弃西医而学习中医的。先生学医无人指导，盲目购买的第一本医书，是日本下平用彩著、浙江汤尔和翻译的《诊断学》，是当时比较先进的西医书。汤氏反对中医，在书的序言中说：“……吾固知中医之已疾，有时且胜于西医，但此系结果，而非其所以然。徒以结果与人争，无已时……”意思是说“我当然知道中医能够治病，有时且比西医为好，但这只是治疗效果，而所以取得这些效果的道理，中医则讲不出来。既然讲不出道理，只用治疗效果与别人争辩，那是不能说服人的。”看了这段话，先生发现连西医也承认中医治病疗效不比西医差，只不过因中医讲不出西医学的道理，才瞧不起中医。他想：“结果”和“所以然呢”何者重要呢？余不可能知道汤氏本人如果患垂危之病后，他是愿意明白地知道其所以然而死去，还是想法活着而宁肯暂时不知其所以然呢？作为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来说，都会以救人为第一，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而不会由于暂时讲不出道理，便置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弃而不顾，听任病人死去而还说“可告无愧”（汤氏语）。

先生曾说：“世上真有无因之果吗？中医能愈病，必有其所以然的道理，中医已经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所谓‘其所以然’，只能是说用西医的理论不能解释中医中药治病的道理所在。另外，对中

医中药治病即使目前尚难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也不应作为中医不科学的证据。科学领域的未知数太多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不仅是中医学有这样的问题,其他学科,包括西医学也有这样的问题。‘行易知难’,‘不知亦能行’,这是近代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他在《建国方略》的‘心理建设’中,以饮食为例证明不知亦能行。他指出,很少有人完全了解饮食入腹后的详细消化过程,也很少有人了解人体正常生理需要哪些营养,以及哪些食物各具哪些营养,但是人们还是每天都在进食的。这证明不知并不碍行。但汤氏却一定要抛弃中医疗效于不顾,偏偏在‘所以然’上将中医一军,这显然是错误的。”既然中医有良好的疗效,相信其效果必有其所以然的道理,先生坚定了学习中医的信心和决心。

先生家境并不充裕,学医又无家传师承,从旧社会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员,到晚年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中医学家,靠的是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先生早年爱好广泛,书法、音乐、戏剧、文学等,无不涉猎,而当立志学医之后,便放弃了这些爱好,把全部精力放在医学上。先生数十年如一日,晨起必读,夜晚笔录,已成习惯。而且,无论在家或外出,有暇便读,兴会所至,常废寝忘食。真有古人“三余”“三上”之学风。先生读书每遇难解之处,从不放过,总是苦思冥想,直至得出满意的解答,方肯罢休。家境清贫,买书不易,故常借书手抄。正是这样认真地边读边抄,才使青年时读过的医学典籍,有不少篇章至八十岁高龄时还能背诵如流。先生常说:“无师传教,养成了苦思的习惯;买书不易,锻炼了背书的工夫。”又说“强记硬背,工夫并不白费”;“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这种刻苦的自学方法和精神,是先生学医成功的经验之一。

先生衣着俭朴,饮食随便,情志恬淡,不务名利,始终把研究学问,追求知识,作为人生最大的乐事。先生几十年如一日,专心致志于祖国医学的研究,直至晚年,仍手不释卷,勤于写作。正是经过终生不懈的努力,才使其无师自通,对中医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奠定了在当代伤寒学术史上的地位。《人才》杂志曾发表署名文章,介绍他的自学经验,作为自学成才的典范。

二、治学严谨,善于读书

先生素以治学严谨著称,最反对在学术上人云亦云,不求甚解,认为这是近于自我欺骗的不良学风。先生读医书,也看注解,但决不盲从,而是认真探讨,反复论证。他常说:读书虽多而不求甚解,充其量不过一书贾尔。当然,先生由于是自学中医,也走了许多弯路,浪费了不少精力。但在多年的自学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读书与研究问题的方法。

(一) 博览群书,由博返约 先生说:过去有句成语“六经根柢史波澜”,是说要想写出一篇有价值的文章,首先要把“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吃透、记熟,这是基础,还须有历代的史料,加以充实和润色,才能把文章写的有声有色,有证有据,波澜起伏。先生认为中医学的根柢是《内经》、《难经》、《本草经》、《伤寒论》、《金匱要略》等。这些经典著作,对于中医的生理、病理、药理、诊断、治则等,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不掌握这些,就会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想把中医学的根深蒂固,是不可能的。但仅靠这些经典著作还不够,因为这些著作,毕竟是原则性的理论较多。而这些理论,若不加以阐发论证,不结合临床体验,仍不易学深学透。这就要求学者,除经典著作外,还要广泛地阅读其他医家著作,尤其是历代名家的著述。“读书破万卷”,虽然因各种不同的条件限制,千卷、百卷也可能读不破,但每个学习中医者,都应该有这种雄心壮志。

中医学从汉代以降,距今近二千年,在这二千年中,堪称中医名家的至少也有数百家,他们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更仆难数。在这浩繁的卷帙中,学派不同,立说各异,互相补充者固然不少,互相矛盾者亦往往有之,若不加以分析归纳,去伪存真,则阅读的越多,就越杂乱无章。故只博读还不行,还要由博返约,才算真正学到手。先生所谓的由博返约,是从全面资料中,归纳出几个重点,从不同的现象中,找出其共同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易事,不下大工夫,不学深学透是做不到的。比如陈修园著的《医学三字经》中有这么几段话:“迨东垣,重脾胃,温燥行,升清气……若子和,主攻破,中病良,勿太过……若河间,专主火,遵之经,断自我……丹溪出,罕与俦,阴宜补,阳勿浮。”他把李东垣的用药规律,归纳为“重脾胃,升清气”;把张子和的用药规律,归纳为“主攻破”;把河间诸说,归纳为“专主火”;把朱丹溪的《格致余论》等归纳为“阴宜补,阳勿浮”。这就是由博返约。这样的归纳,言简意赅,易于掌握,也便于记忆。

对于金元四大家,先生还从其治疗技巧上又作了进一步归纳。东垣诸方之所以补而不壅,全在于补中有行。如升麻、柴胡、陈皮、木香等气分药,都是他常用的配伍之品。河间诸方之所以寒不伤中,全在于寒而不滞。其常用药如走而不守的大黄、芒硝自不必说,就是守而不走的芩、连、栀、柏等,也都与枳实、厚朴、木香等气分药合用,使苦寒之药,只能清火,不至于留中败胃。他虽然有时也纯用守而不走的苦寒剂,如黄连解毒汤等,但这是少数。子和主攻破,毕竟是施用于经络闭塞或肠胃淤滞之实证,如果不实而虚,则非所宜。丹溪养阴,也是在误服金石燥烈药,元阴被劫,相火妄动的情况下才相宜,如果阴

盛阳衰,亦为大忌。

先生在初学金元四家学说时,觉得四大家各不相同,究竟哪一家好呢?在学习中又把四家学说作了归纳:张子和的攻破,是去邪以安正;李东垣的重脾胃,是扶正以胜邪。当正虚为主时,采用东垣法;邪实为主时,采用子和法,二者并不矛盾。刘河间之寒凉,是泄阳盛之火;朱丹溪之补阴,是治阴虚之火,两家都能治火,只是虚实有别。通过先生这一归纳,主次有别,经纬分明,临床就可以根据邪正虚实,取各家之长,对证选方,并行不悖。这就是由博返约。

(二) 尊重古人,不迷信古人 博览群书是要把前人的经验智慧继承下来,然而前人的说教,并非都是金科玉律。先生认为:任何名家权威,都会有千虑之一失。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尊重古人,又不迷信古人。读书要善于选精去粗,瑕瑜分明。他举《内经》《难经》为例,《内》《难》是中医理论的宝库,但这些宝贵的经典著作中,也存在着脱离实践的糟粕。如《灵枢·经水篇》,以中国河流、江、淮、湖、海等比拟十二经脉,意义就不大。《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篇》认为,人从七岁起每加九岁,如十六岁、二十五岁、三十四岁、四十三岁、五十二岁、六十一岁,皆形色不相得者的大忌之年,这更是形而上学,《难经·四十一难》解释肝脏为什么有两叶,认为是“去太阴尚近,离太阳不远,犹有两心,故有两叶”。“三十三难”用五行解释肝肺,不但把五行讲成教条,且说肝在水中生沉而熟浮,肺在水中生浮而熟沉,其说法也与客观事实不符。还有“十九难”的“男子生于寅”,“女子生于申”等,星相、子平之流引用这样的术语,还有的可说;若在有关生命的医学著作中引用,岂不荒谬!

所以,先生强调,读经典著作要一分为二。就是对其注疏,阅读时也要有分析、有批判。有的竟不是错在经典原作上,而是错在注疏上。如果不加以分析,照搬不误,就会自误误人,流毒无穷。先生举《伤寒论·辨脉法》中的“风则伤卫,寒则伤荣”为例,认为不管这是王叔和加入的,或是《伤寒论》所固有的,都是似是而非的不可捉摸之词,尽管这种学说已经延续了近二千年,也不要人云亦云,不懂装懂。再如伤寒传经之说,本来一部平易近人的外感、内伤辨证学,却用什么循经传、越经传、首尾传、表里传、传足不传手等虚构之词,把《伤寒论》越讲越离奇,越讲越糊涂,越讲越脱离临床。如此读了不加批判,就不如不读。孟子曾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尊重前人是必要的,但是“信而好古”,则会泥古不化,只有经过一番分析之后,才会探得真谛,才有真知灼见。

(三) 钻得进去,跳得出来 先生认为学习祖国医学,根据内容的不同,大概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以物质为基础的,如生理、病理、药理等,这些必须

仔细钻研，学深学透，牢牢记住，不可模棱两可，似懂非懂。另一种是属于象征性和概念性的，如五行生克、“心为君主之官”等，这些只要明了它的指归、大意就可以了，不能在字句上吹毛求疵。因为这样往往形成钻牛角，走进死胡同。如前面提到的“风伤卫，寒伤营”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先生就采取了钻进去的方法。什么程度上算是风？风又为什么选择了卫？什么程度上算是寒，寒又为什么选择了营？这不是钻牛角尖，是正确的学习态度。先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查遍了自己所能找到的一切注解，尤其是一些名家的注解。多数人公认的是：风属阳，卫亦属阳；寒属阴，营亦属阴。那么风之所以伤卫，寒之所以伤营，是以阳从阳，以阴从阴的缘故。先生认为这样的注释太玄妙了，不能人云亦云。于是结合《内经》，详细阅读，仔细推敲，终于发现，并不存在什么“阳从阳”、“阴从阴”的奥秘。太阳中风和伤寒，有汗和无汗，只不过是卫气受邪后的开合失司而已。这样，从病理得到了正确的解答，就是钻进去了。

先生认为：要钻得进去，还要跳得出来。钻进去，跳出来，是辩证的统一。因为只有钻得进去，才能跳得出来。如吴鞠通跳出伤寒圈子，并非他不钻研伤寒；相反，他已经在伤寒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但在临床上单走伤寒这条路又走不通，才跳出伤寒圈子而另走新路，撇开六经辨证，改用三焦辨证；不用辛温发汗，改用辛凉解表；不必先解表后攻里，也可以表里双解或先泻下，使下后里气通而表邪亦解。这足以证明，只有钻进去，才能跳出来。

（四）不求甚解，必求甚解 不求甚解与必求甚解，一般都认为这是学者读书的两种学习态度，其实这不应看作是学习态度，而应看作是治学方法的问题。好读书不求甚解，是晋朝陶渊明提出来的，像他这样有学问的人，学习态度还能值得怀疑吗？

作为学习态度而言，不求甚解是糊涂过关，对高深难的问题，不敢接触，畏于研究。而必求甚解则与此相反，凡事都要问几个为什么。两种学习态度对比，前者安于自我欺骗，而后者却是积极的、正确的。

先生认为：作为治学方法而论，这两种方法要根据不同的学习内容另作评价。如中医这门学术，其内容，包括名词术语在内，有象征性的、概念性的，也有属于实质而具体的。如“三阳为父”，“三阴为母”，“三阴三阳的开合枢”，以及“肝为将军之官”，“肺为相傅之官”等，这些抽象的概念，只求明白其大意，弄清其精神实质就可以了。这也可能是陶渊明不求甚解的真正涵义。若硬将这些术语与“父”、“母”、“将军”、“相傅”相对证，指这指那，说短论长，就必求深反凿，陷进去而拔不出脚来。至于另一些，如“阳不归阴”、“清阳下陷”、“血中之

气”、“气中之血”、“引火归元”、“滋水涵木”之类，都是有关生理、病理、药理的具体说明，属于实际性问题，则必须穷追不舍，不能轻易放过。如果借口“不求甚解”、囫圇吞枣，就永远学不到真理。

(五) 善于思维，科学思维 先生治学，又极为重视逻辑思维。兹举《内经·热论》为例，他说，一般都认为“二日阳明受之”，是受之于太阳，“三日少阳受之”，是受之于阳明。如果“受之”一词是指受邪于前一经，那么巨阳又是受之于哪一经呢？又如《伤寒论》第8条，“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可是注家都认为针足阳明是防止太阳传阳明，可是太阳病只能传阳明吗？防不防止其传少阳？凡此，都能通过思维而得出新的、更合理的解释。又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欲如运枢”，“运枢”，注家都讲成运动户枢，可是户枢之动，在于人为，或缓或急，随心所欲。这个“欲如”还有什么标准呢？先生认为“运枢”之枢，乃指天枢，天枢是北斗七星之一，一年运行一周，其运动是缓慢的，但是不停止的，用以阐明人体阳气的运行，也当如此。先生钻研问题，有“三问法”，三问就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譬如讲伤寒传经，就必须弄清楚传经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要传经？怎样传经？这三问搞清楚了，传经的问题就不神秘了。从他所撰写的“论传经”一文，可以看出，之所以能揭开“传经”这个千年之迷，除了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之外，更得力于研究问题的科学思维方法。

(六) 自学善思，教学相长 韩愈《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礼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易·兑卦》：“君子以朋友讲习。”这些都说明拜师访友是学者求学问、求进步的有效之路。但良师益友固然重要，却不是关键的问题，俗话说的好：“师傅领进门，修炼在各人”，“大将能与人以规矩，不能与人巧”。可见学习的关键仍在于主观努力。

先生的学习既无师承，也无益友，基本上是自学。这并非他最初认识到自学比拜师访友重要，只是因其所处农村，别说是名医，就是连普通医生，也凤毛麟角，拜谁为师？哪里访友？只好埋头苦学了。先生在自学中遇到的难题很多，常苦思冥想，而一旦有所悟，却又记得非常牢固，比只听人讲深透多了。所以先生对于医学中的某些问题，常有与众不同的看法。这并非他喜欢标新立异，可能是思维天马行空，不受框框的影响，破旧就比较容易的缘故吧！所以他常说：“凡事都要一分为二，缺乏良师益友，迫使我主观努力，坏事也变成好事。”

即使有良师益友，仍应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把师友的见解，化为自己的知识。

先生认为：对老师一定要谦虚，但老师也是普通人，不会白璧无瑕，处处正确。学习就应采取这样的态度。转教学生，也应提倡学生采取这样的态度。先生还说：“余在《伤寒论》的教学中，就有几个问题，是在同学提问的启发下，才得到解决的。孔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就是这个道理。”

三、临证灵活，斲轮老手

先生对中医理论，学得扎实，用得灵活。其辨证常出新意，其用药常出奇兵。故临床处方，有其独特的风格。善用经方，但又不限经方，常以己意自制新方。处方用药颇得仲景心法，轻巧而灵活，药简而效速。

先生说过：初学中医时，有一个想法，就是不全面掌握中医，决不临床看病。这个想法经实践检验，真是太幼稚了。内外妇儿，伤寒杂病，头绪纷繁，千变万化，要掌握全面，非倾注毕生精力不可。而且要学，就要结合临床，如果脱离临床，又想学的全面岂非纸上谈兵？可是先生是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自学中医的，无师指导干临床，比无师指导啃书本难度更大。因为啃书本，先生有古文基础，而搞临床却没有基础。因此，对于行医来说，走的弯路更多。弯路多，失败的教训也就多了。但是这些失败的经验教训，正好可为后学借鉴。

（一）“医之所病，病方少” 先生之学医，是自背书起始的；先生之行医，亦是自背书起始的。1935年，烟台专署考试中医，先生就凭着背书熟，被录取为第二名，成为正式医生。先生接诊的第一个病人，为所在村中一个年约四旬的男性，病人自诉气短，别无他症，经过医生多次治疗无效，先生想起《金匱要略》“夫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于是采取第一方：茯苓、桂枝、白术、甘草，原方与服（当时尚不会加减变化），不想只服下一剂，症状竟完全消失。自此背书、行医的信心也大增。

此后，求诊的人就逐渐多起来了。先生原先所设想的全面掌握之后再行医，实际也不可能了。在最初行医的这期间，主要是以背为用，照搬照抄。如一少妇，时而少腹攻冲作痛，先生就想起“妇人少腹气攻冲，胁腹刺痛当归芍……”有一病人突然一时失去知觉，又想起“乌药顺气芎芷姜，橘红枳桔及麻黄……”总之，这一期间，每遇一病，照本处方，不加不减，竟也取得了一些疗效。

然而，这种刻舟求剑式的看病用药，终究是低层次的，所以不效者多。还有一些病是书上所没见到过的，当然无从出方。于是，随着临床的逐渐深入，开始感觉到所读的书、所记的方太少了。“医之所病，病方少”正是先生那时的

心理写照。他说：“我记的方子虽然少，但也全部背诵了汪昂的《汤头歌诀》、《医宗金鉴》方，陈修园的《长沙方歌括》、《时方歌括》，陈元犀的《金匱方歌括》。还有选择地记诵了一些《温病条辨》方、《医林改错》方等。如果这些还不够，难道说非要把历代方书，如《太平圣惠方》、《和剂局方》等，通通背下来不成？那是不大可能的。这时我对自己能否学好中医，曾经打了个问号。”

先生认为对“医之所病，病方少”，当辩证地看。先生开始每次临证，为了避免临时手足无措，因此每次临证之前，胸中总要先储备一些成方。在病家邀诊时，必先问问病人哪里不痛快？如说头痛，就把有关治疗头痛的方子默想一遍，记不清的再查一遍书，务必在赴诊前胸有成竹。既至临证，又往往把所见的症状硬往所记的方子上套。就连诊脉，也往往是这个方子需要什么脉，而病人的脉仿佛也正好是这个脉。总之，常把病人的脉症，强行纳入事先想用的方剂范围。如此，有些病自然治不好。方既不灵，对中医能否治病自然产生了怀疑。“病方少”，说明作为一个中医应该多读书、多背书。但方子背了不少，临证也有成方，为什么还治不好病？这时先生逐渐认识到，看书少是绝对当不了好医生，看书不少也不一定当得了一个好医生。为什么呢？关键是过去的所谓“学”，只是皮毛，实际中医“辨证论治”的真谛，并没有真正学到手。有了这一番认识之后，使先生的学习和临床，有了一个新的飞跃。

（二）胸中无半点尘者，才可临床 清代伤寒注家柯韵伯谓：“胸中有万卷书，笔底无半点尘者，始可著书；胸中无半点尘，目中无半点尘者，才许可作古书注疏。”就是说，无论著书，或为古书作注，都必须摆脱一切先入为主的框框。先生认为著书如此，作注如此，看病亦如此。并且指出：所谓飞跃，指的是不再重视成方了，而开始重视“辨证论治”，重视辩证的思维和方法的研究。逐渐在临证前不准备成方了，而是注重运用中医的基本理论和四诊方法，去观察病人的各个方面，抓住疾病的本质，选用对证之方。并且在无成方可用之时，自组对证之方，而这些自组方，也确实取得了不少满意的疗效。先生有些自创经验方，如鼻渊方、肾炎方、迁肝方、肺胀方等，药味不多，效果很好。就在此时，他才真正尝到了中医的甜头，开始走进自由王国。

先生经过死套成方的失败后，深深感到自己临床的“尘”太多了，书也读“死”了。知常达变，活法无常，随证治之，才是中医的精髓。所以，他指出：只有胸中无半点尘者，才会临床行医，诊病处方。只要胸中无“尘”，临证随手拈药组方，也会效如桴鼓。现举几个简单的实例说明之：

1. 一个十余岁的患儿，西医诊断为“癫痫”，经过不少医院的中西医久治

不愈。问病知是在夏月烈日当空的野外割草时晕倒后发病的，此病当属于中医之“暑厥”，便撇开一切治癫痫的成方不用，与以生脉散加蜈蚣、僵蚕、全蝎等人络行痰镇静药，十余剂治愈，从未再发。

2. 一癫痫频繁发作的中年妇女，也是中西医久治不愈，经先生诊治，认为心下有痰饮，治以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略为加减，不但癫痫治愈，就连多年的胃脘痞满，也治愈。

3. 一青年患中耳炎，历时半年，服药近百剂，始终无效。先生诊视，脉迟舌淡，耳流清水，不浓不臭，便排除一切治耳消炎方，予以四君子汤加炮姜、白芷，一剂效，三剂愈。

以上三案，都不是什么难治之病，为什么久治不愈呢？因这些医生胸中只有成方，而且抛弃辨证，又不善于用经方，“尘”太多了，才使患者久治不愈。

先生从摆脱教条，注重辨证之后，不但对于临床治病比以前更有把握，而且对于阅读医书，也觉得和从前不一样。从前他只喜欢看有方有药的著作和开门见山的医案，而对于理论性的著作和像《临床指南》那样需要加以分析的医案，就看不进去。可是对辨证有了深刻的体验之后，治学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不但喜欢看理论性的著作，而且看病案也有了自己的分析鉴赏和批评能力。从教以后，先生始终对现行的各科临床教科书不满意，主要认为在“辨证”上写得不深不透，分型分得太死，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教条。因此，先生主讲的《伤寒论》课程，从来不用统编教材。

四、诲人不倦，一代良师

先生从教近40年，可谓桃李满天下。先生不但学术观点独到，教育思想和方法也颇具特色。他教育学生，首先是提倡要善思。力主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学习中医，主要开发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他认为强记硬背固然重要，而对学习中医来说，辨证论治的思维方法更为重要。所以他讲课往往是引而不发，课堂有“三问法”，就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他常说，中医的流派太多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如不善于加以分析，不善于思考，就必然如坠云里雾里。

先生教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处处注重与临床相结合。他认为中医的理论虽然具有思辨性的特点，但最终理论是指导临床的。研习中医切忌脱离实际，空谈理论。

先生行医，始于医疗条件最差的农村，不但有大量的实践机会，而且广大劳动人民生病后，多任其自然发展，因此得以观察到不少疾病的初起、发展、转

归的全过程,所以先生能从临床的角度,把教材的内容讲得更生动形象,学生不但喜欢听,而且记得牢。有些毕业多年的学生经常提到,他们至今对先生讲授的《伤寒论》课,记忆犹新。有些学生说,他们临床之所以喜用经方,与先生教学有方是分不开的。

先生八十岁高龄时,虽然不给本科生授课,仍然带着研究生,一心一意为培养中医接班人而努力工作着。他平时寡言笑,但每有学生或青年教师来访,请教学术问题时,便口若悬河,常谈至深夜。有人劝他注意娱乐和休息时,他总是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就是古人的三乐之一。

他还以身作则,教育青年一代要奋进不息。虽已古稀之年,仍手不释卷,孜孜以求。他常引孔子的话“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以激励自己,“戒之在得”,说明先生虽已迟暮之年,进取之心仍很坚强。

五、求异创新,伤寒大家

伤寒学说研究,是先生学术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先生从事《伤寒论》教学与研究达三十余年,以其丰富的经验、渊博的学识,对《伤寒论》的争议问题、疑难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以其独特的思辨、非凡的勇气,对伤寒学说中某些传统的观点,进行了大胆细致的驳析,从而提出了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李氏伤寒学术思想体系。

先生先后撰写出版了《伤寒解惑论》《伤寒论语译》《伤寒百问》《伤寒串讲》等伤寒研究专著,并撰写发表二十余篇伤寒学术论文。特别是《伤寒解惑论》的出版,在国内外伤寒学术界震动很大,从此奠定了先生在当代伤寒学术研究中的地位,成为全国颇具影响的伤寒学家。湖南中医药研究院叶发正研究员撰写的《伤寒学术史》,在“现代伤寒名家对伤寒学的贡献”中将先生列于第二位(列冉雪峰后),并指出:李氏研究《伤寒论》最主要的有两条原则,一是要与《内经》《难经》《本草经》《金匱要略》相结合,但不要牵强附会;二是要结合临床来体会,而不是文字表面走过场。根据这两条原则,加之他有多年的临床经验,雄厚的古文修养,独特的思辨能力,所以他的论著享誉海内外,称得起现代的伤寒著名学家。

纵观先生的伤寒研究及著述,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及影响,关键在于其专著也好,论文也罢;长篇也好,短篇也罢,总是独树一帜,观点鲜明,言之有物。之所以如此,关键又在于先生的文章思辨性很强,善于辨析问题,说理深透。以致凡读其文者,同意其观点也罢,不同意也罢,总能引起浓厚的兴趣,有一种非把此问题钻研透彻的欲望。所以,学习先生的学术思想,掌握他